

从于阗到敦煌 ——以唐宋时期图像的东传为中心

From khotan to Dunhuang :

Based on the Images spreaded to the East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陈粟裕 著



从于阗到敦煌

——以唐宋时期图像的东传为中心

From Khotan to Dunhuang:
Based on the Images spreaded to the East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陈粟裕 著



方志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Local Record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于阗到敦煌：以唐宋时期图像的东传为中心 / 陈粟裕著 . —北京 : 方志出版社 , 2014. 12

ISBN 978 - 7 - 5144 - 1483 - 7

I . ①从… II . ①陈… III . ①佛像—宗教艺术—艺术史—研究—中国 IV . ①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313 号

从于阗到敦煌——以唐宋时期图像的东传为中心

著 者：陈粟裕

责任编辑：徐 宏

出版人：冀祥德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9 号（国家方志馆 4 层）

邮编 100021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方志出版社发行中心

电 话 （010）67110500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20.25

字 数：337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4 - 1483 - 7/K · 1125 定价：70.00 元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一) 编委会

主任：李 扬 王晓初

副主任：晋保平 张冠梓 孙建立 夏文峰

秘书长：朝 克 吴剑英 邱春雷 胡 滨（执行）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宪群	王 巍	王利明	王灵桂	王国刚	王建朗	厉 声
朱光磊	刘 伟	杨 光	杨 忠	李 平	李 林	李 周
李 薇	李汉林	李向阳	李培林	吴玉章	吴振武	吴恩远
张世贤	张宇燕	张伯里	张昌东	张顺洪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陈春声	卓新平	罗卫东	金 磐	周 弘	周五一
郑秉文	房 宁	赵天晓	赵剑英	高培勇	黄 平	曹卫东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谢红星	谢寿光	谢维和	蔡 眇
蔡文兰	裴长洪	潘家华				

(二) 编辑部

主任：张国春 刘连军 薛增朝 李晓琳

副主任：宋 娜 卢小生 姚冬梅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宇	吕志成	刘丹华	孙大伟	曲建君	陈 颖	曹 靖
薛万里						

序一

博士后制度是 19 世纪下半叶首先在若干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培养高级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积极倡导，在邓小平同志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始酝酿实施博士后制度。1985 年，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

中国的博士后制度最初仅覆盖了自然科学诸领域。经过若干年实践，为了适应国家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决定，将设站领域拓展至社会科学。1992 年，首批社会科学博士后人员进站，至今已整整 20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突飞猛进之时。理论突破和实践跨越的双重需求，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科学在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手段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正是这种差距，激励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正视国外，大量引进，兼收并蓄，同时，不忘植根本土，深究国情，开拓创新，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发展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短短 20 余年内，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中国的社会科学不仅基本完成了理论上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而且在中国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

伟大创造。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功不可没。

值此中国实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 20 周年之际，为了充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研究成果，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进一步发展，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反复磋商，并征求了多家设站单位的意见，决定推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作为一个集中、系统、全面展示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的学术平台，《文库》将成为展示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学术风采、扩大博士后群体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园地，成为调动广大博士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加速器，成为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领军人才的孵化器。

创新、影响和规范，是《文库》的基本追求。

我们提倡创新，首先就是要求，入选的著作应能提供经过严密论证的新结论，或者提供有助于对所述论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思路。与当前社会上一些机构对学术成果的要求不同，我们不提倡在一部著作中提出多少观点，一般地，我们甚至也不追求观点之“新”。我们需要的是有翔实的资料支撑，经过科学论证，而且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的论点。对于那些缺少严格的前提设定，没有充分的资料支撑，缺乏合乎逻辑的推理过程，仅仅凭借少数来路模糊的资料和数据，便一下子导出几个很“强”的结论的论著，我们概不收录。因为，在我们看来，提出一种观点和论证一种观点相比较，后者可能更为重要：观点未经论证，至多只是天才的猜测；经过论证的观点，才能成为科学。

我们提倡创新，还表现在研究方法之新上。这里所说的方法，显然不是指那种在时下的课题论证书中常见的老调重弹，诸如“历史与逻辑并重”“演绎与归纳统一”之类；也不是我们在很多论文中见到的那种敷衍塞责的表述，诸如“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统

一”等等。我们所说的方法，就理论研究而论，指的是在某一研究领域中确定或建立基本事实以及这些事实之间关系的假设、模型、推论及其检验；就应用研究而言，则指的是根据某一理论假设，为了完成一个既定目标，所使用的具体模型、技术、工具或程序。众所周知，在方法上求新如同在理论上创新一样，殊非易事。因此，我们亦不强求提出全新的理论方法，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要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来展开研究并构造论著。

我们支持那些有影响力的著述入选。这里说的影响力，既包括学术影响力，也包括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就学术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达到公认的学科高水平，要在本学科领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若干年后仍然能够为学者引用或参考。就社会影响力而言，入选的成果应能向正在进行着的社会经济进程转化。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有一个转化问题。其研究成果要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向现实政策转化，要向和谐社会建设转化，要向文化产业转化，要向人才培养转化。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想发挥巨大影响，就要瞄准国际一流水平，站在学术高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尊奉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我们强调恪守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坚决抵制各种学术不端之风，自觉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当此学术界世风日下之时，我们希望本《文库》能通过自己良好的学术形象，为整肃不良学风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年9月

序 二

在 21 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人才已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从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

培养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科研能力和研究成果作为国家的“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胡锦涛同志强调，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的更大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国家与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切实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展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情怀与世界眼光，力争在当代世界思想与学术的舞台上赢得应有的尊严与地位。

在培养和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战略与实践上，博士后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是在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

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建议下，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经国务院批准于1985年开始实施的。这也是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二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我国已建立了科学、完备的博士后制度体系，同时，形成了培养和使用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政府调控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服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明特色。通过实施博士后制度，我国培养了一支优秀的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他们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依托自身优势和兴趣，自主从事开拓性、创新性研究工作，从而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突出的研究能力和强烈的探索精神。其中，一些出站博士后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在“长江学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重大科研人才梯队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可以说，博士后制度已成为国家培养哲学社会科学拔尖人才的重要途径，而且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造就了一支新的生力军。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博士后的优秀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现实意义，但往往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这些成果不能尽快问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现实作用，着实令人痛惜。

可喜的是，今天我们在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研究成果出版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的科研成果，并为其提供出版资助。这一举措不仅在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上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而且有益于提升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的学术地位，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更有益于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今天，借《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出版之际，我衷心地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部门与机构能够了解和关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博士后及其研究成果，积极支持博士后工作。可以预见，我国的博士后事业也将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晓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2年9月

摘要

艺术史视野中的于阗佛教艺术，包括于阗本土的艺术遗存（地理上的于阗）与保存在汉地的、具有于阗因素的图像（于阗之影响）。本书即通过唐宋时期（7~1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展示于阗在图像传播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汉地的影响。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上的新疆和田市古称于阗，4世纪至11世纪时为西域大乘佛法兴盛之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印度、中亚与汉地之间起到纽带作用，是中亚图像传往汉地的重要中间环节；在从于阗向汉地的传播过程中，商人、使臣、僧侣们将于阗的经典与佛教图像带入汉地，从而影响到了汉地的佛教艺术。这些受到于阗影响而产生的图像被保存下来，敦煌石窟即是集中之处。

由此，研究的两个部分各有重心，笔者选择了于阗本土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毗沙门天王像、《金光明经变》来展示于阗图像的本地特色。敦煌石窟中保存下来的具有于阗因素的图像则分为于阗传入的样式与凭借经典创造出的“于阗图像”两个方面来展示。前者的代表为于阗瑞像、于阗守护神，后者的典型是牛头山与于阗王的塑造。

在于阗本土，来自印度、中亚、龟兹、汉地等区域的艺术风格呈现出杂糅的趋势，大量图像带有鲜明的外来痕迹，而在此处又被部分吸收与改造，带上于阗本地的特色。如近年挖掘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即是体现交融性的例子。此寺中的一尊白衣佛像为明确的印度图像传入，于阗人对其加以璎珞装饰，还赋予其新的身份，改造后的图像以瑞像的方式传到敦煌。连接性的传播之外，于阗本地还对一些造像的样式起到固定作

用，如对汉地产生深远影响的毗沙门天王像，在西域形成固定样式之后传入汉地，在初传汉地时，其本身的样式与眷属的配置都体现了鲜明的于阗本土文化特征。《金光明经变》在8世纪的于阗、敦煌广为流行，通过图像与文本的比对，能够看出各地对同一经典不同的需求。

在佛教与艺术的传播过程中，汉地对于于阗的艺术、图像更偏重于选择性的吸收，而不是全盘接纳，用于阗因素来指代这些图像具有的于阗特点更为合适。它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从于阗传入的固有图像，这类图像在于阗是有原型存在的，本身与于阗本土的艺术、风俗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于阗瑞像、于阗守护神。另一类是依附于佛教经典或者其他文献资料而产生的图像，这类图像源自民众对佛经的诠释或是对于阗的遐想，如圣地牛头山、“新样文殊”中牵狮子的于阗王。通过对这两类图像的研究，可以发现于阗佛教影响汉地的确切方式：造像样式以及重要经典的传播。而汉地对于于阗佛教艺术、于阗经典的吸纳体现在对传入的造像样式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汉地的审美习惯与时代风格；在对经典的研读中展开对于阗佛国的想象，由此塑造了汉人心目中的牛头山和于阗王。

敦煌地区因其便捷的交通与8~10世纪的政治格局，在唐宋时期与于阗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如8世纪吐蕃人统治河西和西域时、10世纪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王族联姻时，敦煌石窟中出现了大量具有于阗因素的图像，有的图像传播可能仅仅止步于敦煌。通过这两个阶段图像的研究，可知8世纪以后，流行于于阗的末法思想传入敦煌之后产生较大影响。为了守护领地与佛法，敦煌本地民众借用了瑞像、于阗守护神等神祇来护佑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则是两地交往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间段中，大量于阗人活动在敦煌，加速了两地间的直接交流。在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族的供养像，通过对这些具有于阗因素的图像的考察，揭示出至少在晚期的于阗社会上层，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而这种汉化的来源，很可能是与之关系密切的敦煌。这也说明于阗和汉地的佛教图像传播并非单向。

通过9组个案的研究，在图像比对、分析的细节之中，我们能够连缀起从于阗到敦煌、中原地区间图像的传播脉络，将几个区域对于外来图像的认识、改造、再利用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些图像细节也展示了民族之间、区域之间的交流状况。于阗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东传，使我们能够具体而深入地了解于阗在整个丝绸之路南道上起到的作用，从而使于阗佛教艺术得到更为准确的定位。8世纪至10世纪之间，于阗和汉地之间文化相互交流、艺术相互熏染的历史面貌也由此清晰。

关键词：于阗因素 佛教样式 于阗守护神 金光明经信仰 瑞像 于阗供养人

Abstract

This book studies Buddhist art of Khotan t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Khotan in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in the forms of both written scriptures and art works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Khotan is the ancient name of the city of Yutian, Xinjiang, now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route of the Silk Road. What this manuscript means by “Buddhist art of Khotan” refers to both art works that were produced in the Khotan area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Indian and Central Asia and images with Khotanian elements that have been preserved in the Han area, or, more specifically, in Dunhuang.

From four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Khotan was a center of Mahayana Buddhism and served as a crucial linkage between India, Central Asia, and China. It is via the mediation of Khotan that Buddhist images (and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arrived in the Han area. Dunhuang was the place where most of those images made their impact on the Han peopl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Dunhuang and Khotan were frequent and sustained between the eighth and tenth centuries, because Hexi、Xiyu was under Tibetan rule in the eighth century and Dunhuang was governed by Caoshi in the tenth century, who intermarried with the royal family of Khotan. This explains the existence of a huge number of images marked with Khotanian elements in the caves of Dunhuang. Some of these images appeared only in Dunhuang and not any other region in the Han area.

This project is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Buddhist art at two locations, Khotan and Dunhuang, from the eighth to tenth centuries, that is, the Tang – Song period. It looks at nine cases, comparing the details of visual images and considering the interaction of written and visual texts, to illustrate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from Khotan to Dunhuang and then other regions of the Han area. To name these cases in particular: (in the Khotan area) the Buddhist statue in the recently excavated Topulukdong I Buddhist temple, the image of Vaishravana, and the images of Suvar na – prabhāsottama – sūtra.

In Khotan, local artists absorbed and transformed styles from India, Central Asia, Kucha, China, and other areas and generated a new cosmopolitan art with distinct Khotanian features. In Dunhuang, the Han people did not simply receive art from Khotan as a frozen package. They not only embraced prototypical Khotanian images, disconnecting them from Khotanian customs and adapting them to the aesthetics norms of the Han area at the time, but also produced wholly new images based on descriptions in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how the Han people imagined the Khotanians.

Grounded in fieldwork, archival research, and image analysis, this book highlights the strategic location and role of Khotan in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to China and draws a map of image transmission that supplements the translation of written texts. It contributes to art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religiou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 particular, and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Tang – Song period.

Key Words: Khotan factors, Buddhist style , Khotan patron saint, Faith of Suvar na – prabhāsottama – sūtra, Khotan representations of famous images , Khotan patrons

目 录

绪 论	1
一 选题介绍	1
二 研究方法与思考问题	4

上编：于阗本土的图像研究

第一章 于阗佛教图像的发现与研究	11
第一节 于阗遗迹的考察与发掘	11
第二节 和田唐代佛教遗迹的基本概况	19
第三节 于阗本土艺术的研究史	24
第二章 托普鲁克墩 1 号佛寺的图像研究	29
第一节 托普鲁克墩佛寺的七佛图像	29
第二节 佛寺内的守护神图像	41
第三章 于阗毗沙门天王图像的传播与演变	47
第一节 于阗与长安：毗沙门天王图像的传入	47

第二节 于阗的毗沙门天王图像	53
第三节 毗沙门天王的眷属图像研究	59
第四章 三铺《金光明经变》的比较研究	66
第一节 敦煌石窟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67
第二节 高昌地区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变》	75
第三节 于阗的《金光明经变》	79
小 结	84

下编：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因素研究

第五章 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因素及相关研究	89
第一节 敦煌与于阗的交往与互动	89
第二节 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因素图像	92
第三节 敦煌石窟中的于阗因素图像研究史	97
第六章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瑞像图中的于阗因素	
——以 231 窟、237 窟为中心	106
第一节 231 窟、237 窟中的于阗瑞像概况	106
第二节 手把袈裟的立佛像研究	110
第三节 装饰佛与菩萨研究	115
第四节 于阗瑞像的引入	121
小 结	125